

對傳統貧窮研究方法的省思： 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

李安妮**

壹、貧窮女性化的意涵

由於西方幾個工業先進國家在八〇年代前後，普遍發現其貧窮人口的性別分布呈現出一種從過去的男性集中朝向女性集中的趨勢，因此有所謂「貧窮女性化」(Feminisation of Poverty)的概念提出(Pearce, 1978)。然而對於此一概念的意涵卻有兩種不同的詮釋：早期較多的學者將焦點置於有關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特殊境遇，認為貧窮女性化乃因女性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雖然表面上被賦予較多的經濟責任，然而在參與經濟活動的過程中，並未獲得較多經濟安全的保障，因此反而使得其經濟地位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危險狀況，再加上已有的社會安全制度又無法立即有效地來解除或分擔這些危險，結果就形成了一群新的貧窮女性就業人口(Pearce, 1978; Scott, 1984; Smith, 1986)。這種新興的貧窮現象，一方面顯示了現階段有許多女性的經濟安全，是相當程度依賴自己在勞力市場上所獲得的報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現有社會制度仍然明顯的不利於女性。換言之，現今許多女性所承受的經濟壓力，並非源自個人懶惰的道德性缺失，而是肇因於社會的結構性歧視。這種以強調勞力市場內性別歧視，來解釋女性貧窮現象的論點，往往被一些來自新右派主義(New Right)的學者所批判(Murray, 1984; Glazer, 1988)，認為女性在勞力市場上雖然獲得較少的報酬，但由於她們並不需要養家，因此對於女性貧窮並不會產生直接的影響，只要重建傳統家庭的新秩序，使女性回歸家庭，男性擔負起一家之主的經濟責任(as a breadwinner)，自然沒有所謂女性貧窮的問題了。

* 本文係改寫自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作者在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婦女與兩性研究之方法論」午間座談中，所引言「看不見的女人，看不見的貧窮」一文。

作者對本學刊兩位匿名論文審查者不厭其煩的指正深表謝意。對於中研院社科所同仁朱瑞玲、伊慶春兩位教授，於本文草稿完成時提供極具建設性的寶貴意見，使本文更為完整，作者在此一併致謝。

**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篇審查完畢定稿日期：1994年3月10日）

晚近一些從事有關家庭內部權力結構與資源分布研究的學者，嚴正駁斥這些來自新右派主義的主張，認為女性可以從家庭中得到庇護的說法，並沒有事實的根據，家庭能提供女性多少的經濟安全，完全取決於家庭內部資源分配的型態(Rogers & Schlossman, 1990; Pahl, 1989)。但是，晚近的這些學者對於以強調女性在勞力市場的不利地位，來作為解釋貧窮女性化現象的論點，也不盡同意。他們固然支持有關女性在現有社會結構中是處於不利地位的主張，但他們反對女性貧窮是一種新興貧窮現象的說法，而認為貧窮女性化其實是人口及社會經濟變遷的結果，使得長久以來受到傳統貧窮研究方法的限制，而被隱藏的女性貧窮事實得以顯露出來。因此貧窮女性化並不代表現代女性比過去更貧窮，反而是意味著現代女性的貧窮現象比過去更容易被察覺到(Millar & Glendinning, 1987; Lewis & Piachaud, 1987)。他們並進一步指出這種可被察覺性(visibility)提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女性經濟依賴男性的假設已漸漸成為神話(myth)，這些年來在經濟上完全依賴男性的女性，不但有愈來愈少的趨勢，而且事實上男性的經濟可被依賴性也愈來愈低，因而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機會以獨立個體，而非依賴者的角色出現在各種相關議題上去被討論；另一方面則是來自女性主義的挑戰，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有許多研究者從女性的觀點來從事相關議題的研究，由於她們的努力，致力於打破有酬工作的公共部門(public world of paid work)與無酬工作的私有部門(private world of unpaid work)二者間的籬籬，不但使得女性在家庭私有部門內所從事的無酬工作不再被忽視，更使得有關家庭內部私有關係的研究也不再是一項禁忌，因此間接地揭開了女性在「家庭」此一黑箱內的真正經濟地位(Graham, 1987; Pahl, 1989)。

國內有關女性貧窮的討論，無論是在學術研究的領域，或是在政府行政的部門，都一直未能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其主要的理由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性別」在貧窮研究中，從來不曾被視為重要研究變項來加以分析。雖然性別是一項無須花費多大功夫就可以取得的資料，但是從歷年政府所出版的各種統計要覽或社會發展指標中⁽¹⁾，我們並無法看出貧窮的性別比例，因此也就無法得知女性貧窮存在的程度與範圍了。由於這些有關貧窮的統計資料對於性別是完全不具任何識別能力的，因此在討論貧窮問題時，當然就可能由於看不見女性而導致看不見女性的貧窮了(invisible women, invisible poverty)

註 1：由行政院主計處所出版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社會指標統計」，歷年來對於低收入戶的資料，都只提供總戶數與總人數。而由內部所出版的「內政統計提要」，也只提供低收入戶民衆總數以及所提供慰問款項總額。至於由地方政府所出版的「低收入戶調查報告」，也只有在最近幾年才提供戶長性別的資料。

。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有些針對低收入戶為調查對象所進行的研究，雖然會對性別這個變項的資料加以收集，但往往卻因分析的結果，女性戶長所佔比例相對較低，反被認為沒有顯著的意義而加以忽略，使得好不容易被採用的性別變項形同聊備一格，甚至還有研究者對這種女性相對較少之性別分佈做了一些見樹不見林的解釋，認為這種現象正顯示了中國人是以男性為一家之主的傳統（李瑞金，1988：201）。事實上若從國內女性戶長所佔的比例原本就不高的情形來看（雖然政府的統計資料也從不告訴我們戶長的性比例），低收入戶的這種性別分布早該受到應有的注意了（參見附表一）。由於上述這些因素，使得截至目前國內許多貧窮研究的成果，並無法提供有關貧窮女性化此一概念的任何解釋。

然而，本文的主要目的，並不在尋求一個能賦予貧窮女性化概念最適當的詮釋。無論女性貧窮是一種新興的現象，或是近來才被揭露出的事實，作者認為在試圖探討女性與貧窮間的關係時，首先應該對傳統(conventional)貧窮研究方法的特徵，以及它所依據的一些假設有所了解，同時進一步分析女性主義如何從女性的觀點來批判這種傳統的做法，對女性貧窮研究所產生的影響與阻礙，或許如此才能掌握女性貧窮問題的全貌。本文接著就針對傳統貧窮研究的方法及其假設先作一說明，然後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再來分析這種方法的缺失。

貳、傳統貧窮研究方法的特性及其假設

一般而言，貧窮指的是所擁有的資源不足以滿足需要的一種狀態。由於研究者對於「資源」與「需要」的觀點不同，因此對於「貧窮」的定義便產生了所謂「絕對貧窮」、「相對貧窮」與「生活方式的貧窮」(poverty of lifestyle)等不同概念的爭議。絕對貧窮視「需要」為維持最低生活所必須的消費水準，當資源未能達到此一水準時就被視為是貧窮；相對貧窮則是指在同一社會中經濟狀況相對較差的一群，他們並不必然有貧窮的感覺，可能只是生活需要相對較高但擁有的資源卻相對較少而已；至於生活方式的貧窮所指的則是資源的擁有，無法使其達到社會期許(social desirable)之生活方式的狀態。無論研究者持那一種觀點來定義貧窮，當我們試圖從這些研究結果去了解有關女性貧窮現象時，卻發現它們幾乎無法提供我們任何有關的訊息，主要的原因乃是由於貧窮研究方法上的一項特性使然。

儘管貧窮研究者對於貧窮的含意，至今仍有諸多爭論而無法得到一個共同的想法，對於貧窮的測量也尚未能發展出一套有效的工具，但對於貧窮的分析單位，長久以來卻

一直遵循著一個原則，那就是以共同生活的集合體 (collective unit)來做為分析貧窮的基本單位，而這個集合體通常是指「家戶」(household)或課稅單位(tax unit)。雖然研究者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也針對個人的所得與支出加以調查，但最後目的仍在建立完整的家戶資料，以做為探討貧窮現象之基本資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由政府定期舉辦的貧戶調查報告，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通常政府在提供有關該國的貧窮資料時，都是以家戶為單位來說明貧戶的家戶組成、居住狀況以及家庭的總收支等⁽²⁾。其它一些宣稱以分析貧民的態度或價值觀為主題的研究，也是設法先找到貧戶，再就戶內人口來選取樣本訪問，或進行貧窮理論的驗證⁽³⁾。因此，在採用此種傳統(conventional)方法的研究裡，所指稱的貧窮，無論是絕對貧窮、相對貧窮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貧窮，應當都是指戶內所有成員「共同擁有的資源總數」不足以維持戶內全體成員「共同需要」的狀態，凡是處在這種狀態下的家戶就可以被稱為「貧戶」，而戶內的每一個成員就被視為「貧民」。換句話說，當研究者在討論一個貧窮現象時，他實際上是在討論家戶的貧窮而非個人的貧窮。

此種只討論總體現象而不去分析個體資料的研究傳統，所以在貧窮研究的領域中一直被承襲下去，其主要原因大致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首先，將焦點置於家戶資料的做法基本上是同意「家庭內部資源平均分配」的這項假設。認為家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經濟單位，戶內每一個成員彼此分享共有的資源，個別成員所擁有的資源被視為是用來提供全體成員需要的滿足，因此即便是毫無生產能力的孩童，也將因著資源共享的原則得到需要上的滿足；個人之所以貧窮往往是因為家庭貧窮所致。這種家人間榮辱與共休戚相關的觀念，不但深植於一般人的心中，也合理化了這項研究傳統。反過來看，如果將研究焦點置於個人身上，只就戶內個別成員所得的多寡來決定該社會貧窮的狀況，結果必將膨脹整個社會的貧窮人口數，因為社會上總有許多人沒有屬於自己的所得，就如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老弱婦孺，他們是藉著分享家人的所得來滿足個人生活上的需要；他們也許未曾擁有過任何資源，但也或許從未曾陷入貧窮。Haddad & Kanbur (1990)曾分別以個人(individual)和集體(group)為測量單位，將所計算出來的不均度加以比較

註 2.：例如我國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北高兩市政府社會局定期出版的「低收入戶調查報告」，以及英國由 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所出版的 Households Below Average Incom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等，多年來都是一直採用「家戶」為分析單位的做法。

註 3.：例如鄭為元先生的「貧民之態度：一個臺灣大都會的經驗研究」(1978)，以及廖榮利、鄭為元兩位先生的「臺灣的貧民--社會學與社會工作面的探討」(1992)，雖然都是以貧民為分析單位，前者是在驗證貧窮結構論與貧窮次文化論，後者則是在探討貧民行為與態度，但其實不可避免的還是都在討論貧戶中的貧民。

，結果發現雖然不平均度或貧窮的水準(level)會因測量單位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貧窮的型態(pattern)並不會有任何改變。整體而言以家戶為單位所測量到的貧窮水準，大約是以個人為單位所測得的40%至65%，視所採用的統計量而定；然而，無論選取何種變項來做分類，類別間的變異係數關係並不會因測量單位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因此，他們認為忽略家戶內不平均度，在政策的擬定上並不是嚴重的缺失，反而拘泥於這方面的考慮才是真正耗損成本。由此觀之，採用傳統貧窮研究方法的理由之一，似乎是認為試圖從個人的觀點來研究貧窮現象，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只會提高貧窮程度，並不足以反應社會真實的貧窮情形，對於貧窮研究本身也沒有太多實質上的意義，此一看法的謬誤之處，容本文稍後再做討論。

除了資源共享原則外，消費的不可切割性也是使這個研究傳統得到合理化的原因之一。無論研究者所討論的是絕對貧窮、相對貧窮、或生活方式的貧窮，個人為免於貧窮所必須達到的生活水準仍然可以被個別估算出來的。然而戶內許多的支出一亦即用以維持個人生活水準的支出，事實上是屬於共同消費的項目，個人實際上的支出是很難從家戶中被抽離出來精確計算的；儘管有些消費項目如飲食衣著等，勉強還可以分辨每個人所花費的比例，但是其他更多項目的消費，特別是像冰箱、冷氣或沙發等家庭設備，根本不可能去區分每位成員使用的多寡。因此，當我們試圖從需要面來探討貧窮現象時，不難發現到若以個人為分析單位，不僅在測量上會面臨實際無法克服的困難，就算是能克服這項困難，在貧窮研究的應用上，也將產生錯誤的政策引導。例如以戶內個別成員的需要加總起來做為設定貧窮的標準，將使一般所稱的貧窮線(poverty line)大幅提高，如此一來，不但高估了整個社會貧窮的程度，也使得政策考量的依據失之偏頗。

此外，另一個相關的「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的概念也常被用來支持以家戶為分析單位的研究傳統。這個概念事實上是由家庭內部資源均分與消費的不可切割性兩項假設推演而來。由於資源可以彼此分享，滿足需要所必須的支出又不必然屬於個人，在維持相同生活水準的條件下，共同生活將帶來資源的增加，但需要反而相對的減少。因此一個原來生活條件被認為符合貧窮定義的個人，往往可以透過與其他家人共同生活而不再被視為貧窮，因為在滿足需要所必須支付的費用減少的情況下，他所擁有的資源自然就相對增加了。事實上這樣的想法不僅在貧窮研究上被廣泛的接受，也充分的反映在目前許多有關紓解貧窮的政府政策上，例如社會安全給付水準或住宅政策的相關措施等，就是在考量規模經濟的情況下而制定的。

根據這樣的一個研究傳統所做出來的研究結果，我們實際上只能了解到有關家戶貧窮的程度或家戶致貧的原因，對於戶內個別成員與貧窮間的關係卻難以有清楚的輪廓。

唯一例外的就是家庭經濟主要負責人，其所得反而常常被視為是一項足以反應一個家庭經濟水準的重要指標，這個人的一些屬性也常被用來描述這類家庭的特性，或用以解釋這類家庭致貧的原因。然而由於一般家庭的經濟主要負責人往往被認為應該以男性為主，絕大多數的女性總是被視為依賴人口，於是「性別」這個變項在傳統研究方法的主導下，就常因一致性過高而被認為沒有加以分析的必要，結果導致無論是在官方或非官方的貧窮統計與研究中，嚴重缺乏有關性別的資料與討論，因此一般人也就誤以為貧窮是一種性別中立的現象。

參、來自女性主義研究的質疑⁽⁴⁾

事實上，我們若回顧一些從女性的觀點來探討女性經濟地位的相關文獻，將會發現到採用這種傳統的研究方法，可能會遭遇到來自幾個方面的挑戰。首先，對於家庭內部資源平均分配的這項假設，就不被視為是一項通則。根據八十年代早期在英國所進行的幾項針對夫妻間財務分配型態之研究發現，可以歸納出雖然仍有一半左右的家庭採行共同管理財務的辦法，但他們大多屬於幸福美滿、或無經濟困難的家庭；對於經濟條件較差，或妻子必須照顧學前子女而沒有工作的家庭所進行的研究，則發現到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是採共同管理的方式，有四成多的家庭是採先生固定給妻子津貼的方式。而針對婚姻較不美滿或妻子有被毆打記錄之家庭所做的研究，則發現到只有5%的家庭是共同管理錢財，有一半的家庭是以給津貼的方式管理錢財，另外各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家庭分別由妻子或丈夫獨自管理錢財(Pahl, 1989:67-78)。最近的一項研究結果更是明確的指出，在英國真正實行平等共有財產制(egalitarian "pooling" system)的家庭最多不超過五分之一(Vogler, 1989)。雖然這些研究各自有所發現，但家庭財務分配方式的多樣性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Pahl同時還進一步指出，家庭本身收入的多寡，是影響家庭財務分配方式的重要因素：當家庭收入有限時，典型的是由妻子來管理錢財，因為此時財務管理是一項吃力的工作，而不是權力的來源；但當家庭收入寬裕時，則視妻子就業

註 4：此段落標題，本文原採用「女性觀點的研究對此方法的質疑」，主要乃是為尊重文中所引用文獻之作者對自我的認定，其中有作者明白指出自己並非女性主義的倡議者或支持者，只是關心女性議題(women's concerns)的研究者。因此，作者幾經思考斟酌後，乃決定以「女性觀點的研究」一詞來替代「女性主義」一詞。唯，俟本文送審後，經評審女士先生指出，本文題目副標題既然是「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何以內文改為「女性觀點」，此種前後不一致的立場似有不妥之處。作者一方面為尊重所引文獻作者的原意，一方面又為避免有立場前後不一致之嫌，最後乃決定將本段落標題改為「來自女性主義的質疑」，但特在此註解中加以說明交代。

與否，以及妻子的收入對家庭收入貢獻的大小而定，若只有先生就業，家庭財務的分配方式則趨向於由先生來決定給妻子家用的比例，若妻子也就業，那麼她的收入貢獻愈大掌管家庭財務的權力也就愈大(1989:120-121)。Pahl在往後的系列研究中更將「管理」與「控制」的概念提出，以便澄清「手中有錢」與「手中有權」二者在擁有家庭資源間的差別，結果進一步得到丈夫比妻子有更大權力去控制資源的結論(pp.79-91)。國內一項針對婦女生活狀況所做的調查報告也指出，只有近半數的就業婦女(49.86%)對自己所賺取的工作收入，具有完全的使用決定權，教育程度在初職的婦女，甚至只有將近三成(30.31%)可以完全決定自己工作收入的使用(內政部，1989:85-86)。由此可見，家庭內部資源的分配不但不如假設中的平均分配，而且，顯然女性不但可能分配到較少的部分，也較不具有權力來決定分配的原則。

除了家庭內部資源平均分配的假設受到嚴重的挑戰外，貧窮家庭內的貧窮也被認為不見得是平均分擔的。針對生活在貧窮線下之家庭所做的研究發現，家庭裡貧窮的擔子主要是落在妻子的身上，貧窮所帶來生活品質的下降，也是對女性比對男性有較大的影響。因為她必須在有限的資源下去規劃如何滿足全家人的需要，最常見的就是「擠壓」出時間去兼差，或寧可放棄一些屬於自己的消費，也不會去縮減其它家人的嗜好(Graham, 1987; Parker, 1987)。伊慶春(1993)在回顧有關雛妓的研究文獻後指出，解決家庭經濟的困窘乃是主要的從娼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為解決家庭貧困而賣女從娼，乃是中國娼妓形成的一項特殊原因(p.3)。儘管在她的實證研究中，對於家庭經濟與從娼原因並未得到充分的支持，但在進一步控制省籍後，發現原住民被迫從娼的原因確實是多出於家境困難一項(pp.90-91)。因此，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家庭一旦陷入貧窮，首當其衝的並非那些被認為是家庭經濟主要負責人的男性，反而是那些被視為依賴人口的女性。此外，針對單親家庭所做的研究也發現到女性單親家庭普遍貧窮(Hutter, 1981)，而且與男性單親家庭比較時，更發現二者間存在顯著的差異。Millar & Glenginning使用英國家庭支出調查(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單親母親家庭陷入貧窮的機率是61%，而單親父親的家庭貧窮率只有43%(1987:14)。至於國內的研究也都有相同的發現，指出女性戶長單親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比男性單親家庭來得少(徐良熙與林忠正，1984; 林萬億，1992)⁽⁵⁾。作者曾利用行政院

註 5：國內有些關於單親家庭的研究，在「單親」的定義上仍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一般而言，最適宜且廣泛被接受的定義是指：凡是家中只由父親或母親獨自養育未成年子女即構成單親家庭的條件。重點在於要有「未成年子女」。上述徐良熙與林忠正的研究是以家中是否有「未婚子女」為考量的依據，因此所得到的數據有偏高的現象。至於林萬億的研究，主要是透過兩種方式來推估台北市的單親家庭：一是以文獻資料來推估；另一則是以戶籍資料為之。以市府教育局的資料所推估得到的數據，未考慮那些有就讀國中、國小以外之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同時，對於那些有一個以上子女就讀國中、國小的家庭也產生重複計算的現象。以戶籍資料推估的數據亦有高估的現象，惟在該文後段有所交代。

主計處每年所進行的「家庭收支調查」原始資料，分析國內貧窮的範圍與程度，也發現到整體而言，貧戶中女性戶長的家庭比男性戶長有較高的貧窮率(參見附表二)。雖然這些研究發現都提供了有利的證據，來對家庭內部資源平均分配的假設加以反駁，然而它們也都未能提出更好的方法，來精確測量戶內每位成員真正擁有的財富。Rogers & Schlossman (1990)等人的研究小組，在討論有關戶內資源配置的議題時，除了一致同意了解家戶內部動態關係，是決定經濟發展方案成功與否的主要因素外，同時也分別從經濟學(Rosenzweig & Behrman)、人類學(Messer)以及心理學(Engle)等不同學科的觀點，提出他們認為足以辨識戶內資源配置法則的理論架構，並進一步探討各別理論模型中所包含之變項間的關係，以及搜集相關資料和測量這些變項和的方法。在試圖整合個別理論模型後，形成了一個包含五大類、十六大項的資料類型，每一類型資料內又包括十多個變項⁽⁶⁾。這個模型的確提供我們一個用以測量戶內成員個別擁有福利(well-beings)的一個方向，然而也由於這個模型相當龐大而複雜，應用起來也許就如同Haddad & Kanbur所言是相當耗損成本的，但絕不會掩蓋事實，而是可以更為真實反映社會的貧窮現象。因此作者認為採用資源共享原則來從事貧窮研究的傳統，恐怕是方便性大於真實性了。

同樣的，基於這項假說而認為只有在貧戶內的女性才算貧窮，非貧戶中的女性不可能有貧窮現象的這種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根據針對生活水準正好在貧窮線以上之家庭所做的研究發現，這些家庭的所得之所以能超越貧窮線，主要是來自妻子就業所得的貢獻；但她們為了獲得這份收入所從事的工作多半是低報酬、高危險、無保障的；不僅如此，同時她們的家務責任也並未因此而有所減輕，所以研究結論認為女性往往是以自己的貧窮化(pauperisation)來換取家庭的不貧窮(Pahl, 1980; Land, 1983; Graham, 1987)。另外，在相關的研究中也發現夫妻間對家庭財務的花費也有所不同，Pahl在英國所進行有關家庭花費型態之研究發現，當妻子負責家庭財務時，家庭的收入比丈夫負責財務時，有較大的可能性是花費在食物以及日常生活必需品等項目上；而妻子所賺取的額外收入，也比丈夫所賺取的額外收入，較有可能花費在上述消費上，至於丈夫的額外收入則比妻子更有可能花費在休閒與消遣活動上(1989:151-152)。最值得爭議的地方是，女性的這種自我犧牲和自我否定的做法，往往還被解釋為是一種利他的和喜歡照顧人的本性(altruistic and care-giving nature) (Townsend, 1979)。

註 6：有關此一整合後的理論架構請參考Rogers & Schlossman (1990),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ssues and Method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PP.188-198.

Land & Rose就曾質疑當我們在歌頌某些特定個人具有利他主義的美德時，是否更應該藉以建立起一個全體的利他社會(1985:91-94)。無論採取何種角度來解釋女性這種自我貧窮化的行爲，在非貧窮家庭中的確存在有貧窮的女性，卻是一項不爭的事實。雖然前述 Haddad & Kanbur的發現看似支持傳統貧窮研究方法，但我們若仔細觀察他們所呈現的資料，將發現到考慮戶內差異的結果，雖如同他們所言對組間不均度的型態並沒有改變，但組內的不平均度卻大大的改變了，這正說明了非貧戶中存在有貧窮者，貧戶中則存在有更貧窮者，因此反而支持了女性主義所主張的，以傳統貧窮研究方法來分析貧窮現象，只是將女性貧窮的事實繼續隱藏下去罷了。

此外，還有一項受到質疑的假設，就是根本不將女性在各種社會制度裡，所受到的歧視視爲家庭致貧的原因之一，認爲只有男性的所得足以反映家庭的經濟狀況，女性的所得對家庭而言只不過是零用錢(pin money)罷了，所以女性從勞力市場所獲得的低報酬，和從社會安全制度中所領取的低給付都與貧窮無直接關係，不應該被用來作爲解釋家庭致貧的原因(Layard et al, 1978)。這種說法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以少數經濟完全依賴丈夫的女性來代表所有的女性。事實上，從戰後世界各國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持續上升，就足以證明愈來愈多的女性已不再是完全的經濟依賴者；同時，女性的勞動參與，不但對家庭的經濟改善產生直接的效果，對整個國家社會的經濟發展也有不可抹滅的貢獻。此外，若再加上西方各國目前在人口結構上所面臨的重大變化來看，愈來愈多的女性單親家庭以及單身的女性老人，她們不但不是完全的經濟依賴者，還是完全的經濟被依賴者，她們的每一筆收入都大大的影響家庭總所得，都足以決定家庭的整個經濟狀況，怎能說女性的所得只不過是家庭裡的零用錢罷了？無論從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的事實，或愈來愈多女性身爲家計主要負責人的趨勢來看，已經足夠讓我們重新反省女性在勞力市場的低報酬，以及在社會福利制度裡的依賴角色，到底是不是構成今天貧窮女性化的根本原因。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的討論都是針對傳統貧窮研究方法，以家戶爲分析單位對女性貧窮所產生的隱藏效果。然而，除了分析單位的問題外，在定義與測量貧窮時，未能考慮「所得」(income)以外之其它社會面向的因素，也是形成貧窮研究在提供有關女性議題之討論時的一個盲點。這些因素包括時間、伴隨所得而來的決策權和「外快」(perks)等。就時間的價值而言，雖然每個人所擁有時間的數量大致相同，但是男性的時間顯然比女性的時間具有更高的價值。因爲男性將時間花費於勞力市場以便賺取財務上的報酬時，女性則是將時間花費在必要的家務工作上，而家務工作經常被認爲無法估計其價值，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被視爲毫無價值可供估計的。因此若將所有被花費在工

作上的時間都併入計算貧窮，那麼女性相對於男性的貧窮將不成比例的增加。Scott (1984)就曾指出若將所有被執行的工作都當作應該有所報酬的，則將會發現男性的收入是女性收入的18倍之多。此外，伴隨所得而來的決策權與外快，男性所擁有的亦比女性來得多，但在貧窮的研究上從未曾被加以計算測量。特別是「外快」這一項，許多來自顧主的額外津貼，例如公司配給的汽車、汽油、餐券、禮品或甚至免費旅遊等各種以項目給付(*pay in kind*)的方式來增加的所得，男性獲得的機會遠比女性大得多。

肆、結 語

爲了對西方工業國家的貧窮女性化現象有較滿意的解釋，許多女性觀點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導致女性貧窮的主張，本文則從傳統貧窮研究方法的特性，以及此方法所依據的一些假設著手，然後引用一些女性觀點的研究發現，來對這些假設提出質疑，並對傳統貧窮研究對貧窮的定義與測量作一檢討。作者認爲傳統貧窮研究方法受到來自女性主義最大的批判，就是將女性隱藏在家庭這個單位裡，使女性的貧窮無法顯露出來，因此，惟有解開女性在家庭此一黑箱中的真正經濟地位，才能認識女性貧窮的全貌，而本文就從下列幾個方向來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家庭內部資源的分配並不見得如假設中的平均分配，通常先生對於家庭財務擁有較大的支配權，妻子所擁有的只不過是管理權，因此，在家中事實上先生比妻子有更大的權力去控制家庭資源。其次，貧窮家庭中貧窮的分擔也不見得平均，通常一個家庭陷入貧窮時，做妻子的首當其衝必須在有限資源下做無米之炊，而先生則仍舊可以維持原有的嗜好。第三，生活在貧窮線上的家庭所以可以免於貧窮的困苦，主要是透過女性的自我貧窮化，因此，在非貧窮家庭中也可能有貧窮的女性。第四，主張女性的低經濟地位對家庭貧窮沒有直接影響的學者，是以少數經濟完全依賴男性的女性來代表多數的女性，是與事實違背的，由前面幾個論點來看，女性的經濟狀況與家庭經濟反而是息息相關的。由此看來，想要對女性貧窮的全貌有所了解，首先要認識到以目前廣泛被接受的方法所進行的貧窮研究，在呈現或解釋貧窮現象上有其極限與疏漏之處，所能提供給我們的也只是有限或偏頗的知識。如果我們不能揚棄此一傳統的作法，必像瞎子摸象一樣永遠在渾沌中摸索，摸到突出明顯的就以爲看到了全貌，更嚴重的是摸不到的就以爲不存在。正如Lazear & Michael所言：這個傳統雖然牢固的被建立起來，但它既不必要也不明智(1988: 12)。然而，對於一個經年累月建立起來的傳統，要加以拋棄也不是一朝一夕可即的，在此之前我們除了要承認女性在勞動力市場與社會安全制度中所處不利地位，是導致女性貧窮的主要原因，並繼續從

女性在這兩個場域內的處境去了解她們特殊的貧窮現象外，還必須努力致力於發展一套，足以使我們清楚觀察家庭內部資源分配情形的測量方法。累積目前一些從女性觀點所進行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目標，但是，家庭並非只由夫妻二人組成，特別是東方社會的家庭，如中國人的家庭除了夫妻關係之外，父母與子女兩代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往往也是決定家庭內部資源分佈的一項重要因素。因此，試圖建立起一個從家庭內部的分配來測量貧窮的方法，前途仍是相當坎坷的。也許正如Jenkins 所認為，我們是可以在困境裡有所前進的，只是一方面要強調夫妻間的分配，另一方面又要照顧到代間的分配，想在兩方面都得到滿意的結果確實需要進一步克服既存的一些困難(1991:479-480)。

附表一：我國貧戶中女性戶長的比例

女性戶長 的比例(1)	貧戶中女性戶長的比例		
	全國(1)	台灣省(2)	台北市(3)
1990 11.60	13.01	42.5	62.4
1989 10.89	12.07	--	35.8
1988 10.63	11.43	51.4	35.1
1987 10.45	11.55	39.5	--
1986 10.39	13.45	46.1	--

資料來源：

- (1)作者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每年所進行的「家庭收支調查」原始資料檔分析結果。
- (2)1987和1989資料來自「台灣省低收入戶調查研究報告」，其他年分資料來自「台灣省低收入家庭經濟調查報告」，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編印。
- (3)台北市政府低收入戶總清查報告，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民國七十七年至七十九年

附表二：男性戶長與女性戶長的貧窮率的比較

年度	女性戶長	貧戶	貧戶中		
			女性戶長 的比率	貧窮率	
				男性戶長	女性戶長
1976	5.98	8.74	4.00	8.92	5.84*
1977	6.06	9.97	5.57	10.02	9.17
1978	6.23	9.71	6.47	9.69	10.09
1979	6.69	10.20	5.71	10.31	8.70
1980	6.90	9.45	8.50	9.29	11.64*
1981	7.40	9.91	7.33	9.91	9.81
1982	8.67	9.68	8.84	9.67	9.88
1983	8.70	9.95	9.11	9.90	10.43
1984	9.28	9.85	9.70	9.81	10.30
1985	9.59	10.13	9.97	10.09	10.54
1986	10.39	9.46	13.45	9.13	12.24***
1987	10.45	9.75	11.55	9.63	10.77
1988	10.63	10.38	11.43	10.29	11.16
1989	10.89	10.74	12.07	10.60	11.90*
1990	11.60	11.37	13.01	11.19	12.75*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本表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每年所進行的「家庭收支調查」原始資料檔分析而得。作者在此感謝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慨允使用該項原始資料檔，並對該處饒志堅先生所提供的技術服務致謝！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內政部

1989 台灣地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伊慶春等

1993 雛妓問題防治途徑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李瑞金

1988 「低收入戶家戶人口結構分析」，台灣省七十六年低收入戶調查研究報告，頁 201。台灣省政府社會處。

林萬億

1992 台北市單親家庭問題及其因應策略之研究，市政建設專輯研究報告第233號。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徐良熙 林忠正

1984 「家庭結構與社會變遷：中美「單親家庭」之比較」，中國社會學刊，8:1-22。

徐宗國

1993 「女人和男人的工作與家庭--攸關時間」，婦女與兩性學刊，4:175-206。

英文部份

Glazer, Nathan

1988 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lendinning, Caroline & Jane Millar

1992 Women & Poverty in Britain the 1990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7 Women & Poverty in Britain. Brighton: Harvester Wheatsheaf.

Graham, Hilary

1985 "Caring for the Family," The report on a study of the organisation of health resourc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102 families with pre-school children. Open University.

- 1987 "Women's Poverty and Caring", in C. Glendinning & J. Millar (eds.), Women and Poverty in Britain.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Haddad, Laurence & Ravi Kanbur
- 1990 "How Serious is the Neglect of Intra-Household Inequality", Economic Journal, 100: 866-881.
- Hutter, Mark
- 1981 The Changing Fami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Y.: Wiley & Sons.
- Jenkins, Stephen P.
- 1991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the Within-household Distribution: Agenda for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4):457-483.
- Land, Hilary
- 1983 "Poverty and Gender: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Within Families", in M. Brown (ed.), The Structure of Disadvantage. London: Heinemann.
- & Hilary Rose
- 1985 "Compulsory Altruism for Some or an Altruistic Society for All?" in Philip Bean (et al.), In Defence of Welfare. London: Tavistock.
- Layard, R., David Piachaud & M. Stewart
- 1978 The Causes of Poverty.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Background Paper no. 5. London: HMSO.
- Lazear, E. P. & R. T. Michael
- 1986 "Estimating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ith Adjustment for Within-family Variatio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4: 216-244.
- Lewis, Jane & David Piachaud
- 1987 "Women and Pover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C. Glendinning & J. Millar (eds.), Women and Poverty in Britain.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Millar, Jane & Caroline Glendinning

- 1987 "Invisible Women, Invisible Poverty", in C. Glendinning & J. Millar (eds.), Women and Poverty in Britain.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Murray, Charles

-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Y.: Basic Books Inc..

Pahl, Jan

- 1989 Money and Marriage. London: MacMillan.
- 1983 "The Allocation of Money and the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Within Marriage", Sociological Review 13(2): 237-262.
- 1980 "Patterns of Money Management Within Marriag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9(3): 313-335.

Parker, Gillian

- 1987 "Making Ends Meet: Women, Credit and Debt" in C. Glendinning & J. Millar (eds.), Women and Poverty in Britain. London: Harvester Whertsheaf.

Pearce, Diane

- 1978 "The Feminisation of Poverty: Women, Work and Welfare", Urban and Social Change Review, (February) pp : 28-36.

Rogers, Beatrice Lorge & Nina P. Schlossman

- 1990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ssues and Method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lanning.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Scott, Hilda

- 1984 Working Your Way to the Bottom: The Feminisation of Poverty. London: Pandora Press.

Smith, Joan

- 1986 "The Paradox of Women's Poverty: Wage-earning Wome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B. C. Gelpi (et al), Women and Povert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ownsend, Peter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Penguin.

Vogler, C.

1989 Labour Market Change and Patterns of Financial Allocation Within Households. Working Paper no. 12. Oxford: ESRSC/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

Waring, Marilyn

1988 If Women Counted: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 N.Y.: Harper Collins.

對傳統貧窮研究方法的省思： 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

李安妮*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在探討採用傳統貧窮研究方法，將掩蓋女性在多方面的貧窮現象，而此種隱藏性或不被覺察性的效果，對「貧窮女性化」意涵的詮釋也產生分歧的看法。本文首先說明傳統貧窮研究方法，之所以採用「家戶」為分析貧窮的基本單位，事實上是以幾項廣泛被接受的假說作為其前提的，包括「家庭內部資源共享」、「家庭內部消費的不可切割性」以及「規模經濟」等，對家庭內部運作的一些假設。然而，本文作者認為從許多女性觀點的研究結論可以發現到，試圖以傳統貧窮研究方法所做的研究來解釋女性貧窮現象，至少在下列幾方面是經不起考驗的。首先，家庭內部資源分配型態已被證實存在著多樣性，使得「資源共享」原則無法被接受，由於資源不必然共享，貧戶中的貧窮也不必然平均分擔，研究指出多數貧窮的家庭事實上是女性在承擔貧窮的重擔而並非男性。其次，非貧戶中不一定就沒有貧窮的女性，許多生活水準正好在貧窮線以上之家庭，被發現他們的所得之所以能超越貧窮線，主要是來自家中女性自我貧窮化的貢獻。其三，有愈來愈多的女性不但不是完全的經濟依賴者，還是完全的經濟被依賴者，因此，認為女性在各種社會制度裡所受到的歧視並非其致貧原因的說法，其實是掩耳盜鈴的做法。其四，如果將「所得」此一概念擴及時間或伴隨所得而來的權力，則女性貧窮的範圍與程度將不僅止於上述這些。

關鍵詞：貧窮女性化、自我貧窮化、強迫性利他主義、零用錢

*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RECONSIDERATIONS OF THE APPROACH IN CONVENTIONAL POVERTY STUDIES: A FEMINIST PERSPECTIVE

Annie Lee^{*}

(ABSTRACT)

The main argument in this paper is that the conventional studies of poverty focusing on the resources of collective units have the effect of obscur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causes, extent and experience of poverty.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ncludes three main reasons why researchers have concentrated on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rather than on individuals. First,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equal intra-household resources shared, it is argued that to measure individual income would vastly overestimate the extent of poverty. Secondly, many of the items which contribute to any individual's standard of living are items of joint consumption. Therefore, attempts to assign these items of joint consumption to individuals would be meaningless. Thirdly, sharing a home is assumed to result in proportionately lower levels of need. These assumed "economies of scale" are reflected in many benefit scale rates.

In the second part,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the conventional poverty studies have largely ignore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needs within the units measured, and the particular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f women are therefore obscured in several ways. First, the burden of poverty falls mainly upon women. Secondly, that most families with the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income just above the poverty line are able to escape from poverty is resulted from women's self pauperisation. Thirdly, the assumption of women's financial dependence on men is not only inaccurate but is actually damaging to women. Fourthly, the incorporation into relative definitions of poverty of important social dimensions such as powerlessness and the value of time would enlarge the economic position gap between men and women.

Key words: feminisation of poverty, self pauperisation, compulsory altruism, pin money